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ERIES

国际政治理论 探索在中国 资中筠★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ERIES



国际政治理论 探索在中国 资中筠★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范蔚文
封面装帧 傅惟本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

资中筠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25 插页 5 字数 247,000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08-02856-7/D·521

定价 23.00 元

DI09/02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

编委会名单

主编：冯绍雷 陈 昕

编委：王逸舟 王缉思 冯绍雷

李敏煮 陈 昕 黄仁伟

丛书总序

走向世纪之交的国际社会，以其前所未有的成就，期盼着、静候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

人类从未有过如此辉煌的业绩，也从未面临过如此艰难的选择。

当下之时，人们刚刚庆幸于和平地实现了国际格局的大转换，却又忧心忡忡于帝国崩溃之后的动荡与纷乱；旧有观念系统被冲击后的迷惘与困惑，以及未被摧毁的武力所带来的疑虑与恐惧。人们在欢呼史无前例的繁荣进步之余，还不得不为已经显露、或尚被隐匿的种种不测之虞所困扰：国际交往迅速增加之后所伴生的失控；政治经济体制变迁的同时引发的失却平衡；科技昌盛之后所出现的自然与社会生态破坏；尤其是新一轮大国竞争所酝酿的国际社会的重大变化。凡此种种，无不对这个因循沿袭和重新构建中的国际政治秩序提出巨大的挑战。

恰恰是这种变动与期盼、困境与挑战，渴望着一门能够对当前国际变化指点迷津的成熟的知识门类应运而生。在这种背景之下作为专门研究国家间交往规则与方式、国际结构要

素与机制及其变化规律与逻辑的国际政治学科,不仅无由推却自己的历史责任,而且必须以自身所持有的知识工具,为新世纪的降临催产。

传统的国际政治学科曾有丰厚的积累。这一知识领域对世界体系、国家主权、民族观念、冲突合作、地缘政治,以及交往机制与结构性问题有着诸多理论思考与详尽的实证记载。问题在于,当今的国际变迁已经大大超出这一传统知识门类所能容纳的范围。

当今,人们已远远不满足于对国际事务简单的、或者哪怕是详尽的记录式描述,而往往要求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从描述方式向理论分析方式的转化,已经是客观的国际现实的耳提面命。人们也往往不满足于仅仅或从政治,或从经济,或从军事的单一学科的国际现象分析,国际事务本身早已经跨出了学科的阈域。所以,从单一学科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心理、历史及至包括各门自然科学在内的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已经是学科本身的逻辑发展所使然。恐怕,一个更为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人们还往往不满足于从国际政治与国内问题相互隔绝的眼光来看问题,一个高度一体化的世界,已经把各国国内的变迁与国际交往与世界性事务紧密相连。因此,从国际与国内相互关联的角度来审视当今世界发展的水平,潮流的变迁,甚至于世风的转换,无论对于学科建设,还是对于战略选择与政策判断来说,都是一个格外重要,也格外需要重视的方面。

在海外,面对新世纪的国际政治学者们已经向世人交出了他们的答卷。近年来,蜚声欧美的保罗·肯尼迪、布热津斯基、塞繆尔·亨廷顿,包括基辛格等,已经写出了多部长篇巨著,直面国际巨变,预言天下走势。虽然,这样的一类著述不会

也不可能给出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但是,国外同行世纪末的冲刺,无论如何给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信号: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界将如何回答既是来自客观研究对象的、也是来自同行同代人的挑战?

所幸者,国际问题学术研究领域已经不大可能再是欧美国家的一言堂了。生存与发展、一体化的挑战以及出于对全人类命运的共同关切,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学者,一步一个脚印地营建着自身独特的国际政治知识结构。

当然,要达到这一目标远不容易。中国国际问题学者首当其冲的任务,恐怕是要寻找和形成国际政治专门领域的研究语言与研究规模,并克服模棱两可、大而化之表述的障碍。因为主观臆测、缺乏实证基础的做法,曾经给我们的国际研究与重大问题的判断带来干扰与破坏。

与此同时,构筑国际政治领域独特的概念与范畴体系,也是需学者们皓首穷经,冥思苦寻方能实现的境界。对于一个思辨逻辑传统相对薄弱的民族,这无异是一场脱胎换骨的观念革命。事情恰恰在于,一个没有独特范畴与概念体系的专业门类,就没有权利去担当反映和影响国际政治现实的“理论”角色。

从客观上说,与工业发达国家早期现代化阶段的国际环境相比,当初,西方列强是在一个积贫积弱的环境中以坚船利炮和先进的科技文明开拓新边疆的;而今,当发展中国家起而奋争时,举目四望,国际环境中却早已是强手林立。这样的国际环境反差,也决定了两种国情与国际背景下的国际政治研究将会在研究的主题、方法、素材等许多方面大相径庭。这也是中国国际政治学者必得对当今国际问题作出自己回答的无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所在。

出于上述考虑,本丛书立意于回应国际社会走向新世纪进程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并出于构建中国背景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的长远考虑,延请国内一流的国际政治学者,采用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九五”期间推出一批高质量的国际政治学术著作,以飨海内外的同行与读者。

“当代国际政治丛书”编委会

1995.5

序言

首先为本书略作解题。在研究界,“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常混用,在习惯上“国际关系”用得更多一些。这原本也不必太较真,其含义大体相同,就是指国与国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关系不言而喻应该包括全面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而归结于政治关系。所以在西方国家大学中国际关系专业传统上是设在政治学系。但是二战以后,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日益重要,于是“国际经济”单独成为一科。“国际关系”也就逐步成为综合的学科,中外都有国际关系学院。本书所选的范围指综合的国际关系,尽管不可避免地也把经济关系考虑在内,但不包括对国际经济关系的专门论述。权衡之下,书名定为“国际政治理论”更为恰当,但应作广义的、综合的理解。本书各篇文章中“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提法都有,下文也视情况二者都用,不求统一,谅读者不致误解。其次,如书名所示,本书的范围还有几个限定:一是“理论”,不是一般的描述;二是“中国”,不是介绍外国的著述;三是“探索”,因为目前已有的论述显然还不成熟和完整的理论,只能算探索阶段。

起意编这样一本书是从“有没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个问题开始的。记得1991年在北京召开的一次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国际研讨会上,有一位中国学者提出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顿时引起了西方(主要是美国和英国)学者的强烈反对,其理由是:既称为“理论”,就应有普遍性,何况国际关系当然是跨国界的,所以这一学科从定义到研究的对象都是全球性的,自不应有哪一个国家的“特色”之说。这个问题当时以及后来都没有进一步讨论下去。西方学者觉得不容置疑,而中国学者一方面似乎难以接受这一定论,一方面又底气不足,因为实际上到那时为止,这个领域中国学者的工作引进多而创新少,是述而不著。

那么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么看?从理论上说,西方学者的说法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国际关系所关注的是全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带有全球性的问题,从古到今,分分合合,争斗合作,错综复杂。“理论”也者,是要从这种复杂的演变中找出某些规律来,加以系统化,是归纳,而不是演绎,不同于借用某种理论来解释某个问题或某种现象。按道理讲,这应是客观的,可以有各种学派,但应该无所谓属于哪个国家。也就是说,有关的理论家应该完全超脱于自身所属的国家或集团的利益,在天空俯瞰全球,同时深入探索历史的长河,得出自己的结论,能解释的现象越多,涵盖面越广,概括性越强,有效时间越长,那学说就越高明,也就越接近于“放之四海而皆准”。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完全的超脱几乎和几何学中的点、线、面一样不存在。因为每一个研究者都生活在地球上某一个地域特定的环境中,植根于本民族的历史政治文化和思维方式中。而且“国际”的定义决定了它既是全球的,又主要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这点与哲学不同,哲学思考的是“究天人之

际,通古今之变”,主体是全人类,乃至整个宇宙。即便如此,从不同民族产生的哲学还是具有各自的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这门学科在西方发达兴盛是近百年的事,应该说是实践的总结,而且高度实用,这显然是与英美等国的实力和需要分不开的。例如马汉的制海权影响历史论、摩根索的国家权力与利益,特别是近来的“历史终结”、“民主和平”、“文明冲突”等理论,显然只能产生于西方强势国家,而且是特定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产物。因此,事实上,国际关系理论总是产生并发达于那些实力强、全球影响大的国家,并且主要反映这个国家的关注点和意识形态。因此,至少不能否认不同处境的民族的理论工作者视角必然不同。在这个意义上,有某个国家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个命题有存在的依据。

形形色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大体上可分成两类:一类是论述根本性的发展规律和决定发展进程的主要因素,例如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西方的“民主和平论”,观点虽然截然对立,但都是企图找出决定战争与和平的主要因素这样根本性的问题,而且都有一定的逻辑和经验的根据。“文明冲突论”也应属于此类。另一种是技术和方法性的,姑称之为“亚理论”,例如源于西方而盛行于我国的“博弈论”,特别是其中颇为我国学者喜爱的“囚徒的困境”的提法,都是关于与对手打交道时的心理和运用的方法,与我国的运筹学有异曲同工之处,可用于多方面,例如商业谈判、个人交往等。这是凡有经验的外交家、军事家乃至商人都自发具备的意识,不一定专属于国际关系。我们需要着力的是前一类理论,而且关注重点在当代。一则因为任何研究必须有一定的范畴,否则将泛滥无所归;二则当代世界风云变化,出现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需要新的理论加以诠释。当然,也有一些问题是只要有国际关系就永远

存在的,这些下面将要谈到。如上所述,理论既然是实践的总结,这门学科只能在有全球关注的国家最为发达,二战以后,各种理论在美国层出不穷,而且一度成为大学中的一项热门专业,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有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每当提到我国的国际关系传统理论时,人们言必称春秋战国,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华民族是个早熟、早慧的民族。春秋战国时期的所谓“国家”关系虽然本质上与现代的迥异,但是当时各诸侯国之间打交道的许多概念和内涵,诸如国家利益的出发点、战略与策略的考虑和操作以及对地缘、均势、矛盾主次的关照等等,都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平,有其永久性和普遍性。《战国策》中那些谋士们雄辩的立论更有不少堪与现代的理论相比附——当然需力戒牵强附会。但是自从实现大一统的中国,直到被西方列强轰开大门之前,就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而大门打开之后,近代中国的对外关系是在苦难、灾难以及艰难卓绝的斗争中度过。在以西方为中心的强权政治统治的国际社会中,中国实际上处于边缘地位,知识精英们全神关注的是民族兴亡,对国际政治的观察自然紧扣当时救亡图存的需要,不大可能好整以暇地作客观的理论性研究。

另一个重要事实是,我国当代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问题的研究往往与对外政策不可分,被认为只是有关政府部门的事,而“理论”这样的大事只能由党的领导,甚至唯一的领袖提出,专业工作者(其中也包括学者)的任务是提供资料于先,撰文诠释于后,谈不到独立思考。即使在领导那里,假如有什么涉及外部世界的“理论”的话,也率多自国外引进。早期是全盘接受苏联的理论,也就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论。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反而不

大注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外交政策的提法上有一些创新,例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但是在冷战的背景下,不论具体实践如何,在理论上不可能有所创新,只是对革命导师的论断的解释可以有所不同。例如不论是50年代提倡和平共处,还是60年代提倡世界革命,其依据还是列宁主义。中苏交恶后,中国共产党起初是指责苏共背叛了列宁主义,以坚持列宁的理论为己任,发表了总称为“列宁主义万岁”、“九评”等大文章。后来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学说,作为我国对待外部世界的指导思想。这实际上是以划分敌、我、友为标准对当时世界各国的分类,但是提出者并未作理论上阐述,而是由他人做诠释。对一些根本问题,例如划分国家类型的标准到底是以经济实力、政治制度、国际行为还是与我国关系或潜在的关系为准,只此一端就始终不明确,因此对于这一论断应算作一种战略蓝图,还是理论,在我国一直有不同看法(在美国有些大学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教学中间倒是把“三个世界”和“文革”高潮时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世界革命理论都包括在内的)。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并由于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大大加强,逐步突破了至少两点定论:(1)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世界大战就不可避免;(2)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垄断资本阶段,因而处于“垂死”阶段。不过这种突破是很不容易的,理论上的开放比实践要滞后得多,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大学在国际政治的教学方面仍在沿用前苏联的课本或至少根据同样的体系编写教材。例如对资本主义的存续问题,当时有种种仍想圆过去教条之说的解释,诸如“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等等。直到1988年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不过是根据当时力量对比的现实,企图为尚未解体的苏联赢得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以从事改革,但

是在当时,实际上内外政策比苏联灵活得多的我国却不能公开地予以肯定,研究、分析这一新思维的书不能公开出版。以此为背景,有关某些战争与和平的理论问题的新思路的文章还只能登载在一份供内部争鸣的《未定稿》上(见本书王缉思:《关于战争与和平理论的思考》)。曾几何时,“新”思维已经变旧,足见在实践中显而易见的事实,一旦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就会触及诸多忌禁。

另一方面,的引进来自西方。国门大开之后,林林总总的西方理论映入眼帘,使人耳目一新,对此有兴趣的学者研读、译介唯恐不及,这也是很自然的,如果没有这一步工作使许多有志于此者受到启发,也就难以有近年来的创作。但是,引进西方的理论又造成一些问题:一是西方学者喜欢标新立异,除了确实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有很高学术价值并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学说外,还有种种追求一时新奇的著述。据笔者所见,有几种情况是不足取的:或简单复杂化,把常识性的、其实很简单的问题以各种图表、曲线以及晦涩的术语来表述,使人如堕雾中,实则用貌似高深的形式表述浅显而无甚新鲜的内容;或复杂简单化,企图把千变万化,充满模糊因素的活的现实一律用量化的计算公式来表现,代替常识的、历史的和经验的判断。由于作为前提的必要条件不可能穷尽,其结论往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与现实相背离;或提出一些武断的、论证很不严谨的新论点,一时之间洛阳纸贵,实际上却经不起现实和时间的考验。有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是从概念到概念,从逻辑推理中自圆其说,在大学教学中自我循环,而为有实践经验的国际活动家及学者所不取。多年前,美国有一位正崭露头角的年轻国际政治学者对笔者说,他决心离开他当时所执教的某名牌大学是因为那时他正面临终身教职资格的评审,有一位教授承

认他优秀的同时告诉他：你必须会写那种只有五十个人看得懂的论文才能有希望。但是他不愿写那种文章，而愿意自己的作品让更多的人读懂。后来这位学者没有从事理论而是从事实际的国际关系的研究，著述甚多，都清晰可读。这是说在美国，圈内人对这类理论态度也有所不同。这些理论从80年代初开始随着学术交流的迅猛发展而大量涌入。我国一些青年学者对此充满新鲜感，很难作出判断，有所选择，有的在西方已经被淘汰的，在我国却方兴未艾，甚至越是故弄玄虚，晦涩难懂的，越有吸引力。在某种程度上带坏了我国的学风和文风（当然，当前文风问题主要不在国际研究领域，也不能全归咎于外人）。以上只是提出弊端引起注意，并非否定引进的必要。不论如何，这种“生吞活剥”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其原因就是我国自己在这方面起步晚，积淀少，理由已如前述。

事实上在冷战结束之后，又值人类步入下一个千年时，关于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许多值得思考的新问题，或者需要重新认识的老问题，或以前隐伏存在而如今凸显出来的问题。由于关注的角度不同，对问题的提出可能也各有千秋。根据笔者一得之愚，试列举当前摆在我们面前需要作理论性思考的问题如下：

1. 高科技的发展对国际关系划时代的影响。它改变了战争与和平的规律、国家利益的界定和维护手段、“威胁”和“安全”的内涵等等一系列传统国际关系中的重大问题。从历史上看，科学的新发明和某种技术的发达多次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国家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但是20世纪的突破性的发展确实从根本上改变了许多传统的规律，因此可称为划时代的影响。但是这个“时代”应从哪里划起？是从原子弹的发明，还是从信息时代的到来，还是别的什么？这里提到原子弹，是因为

它改变了战争的观念,实际上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列宁时代在设想共产主义时只能想到“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因为那时电气化是科技发展的最高水平。那时设想的国际关系当然与现代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通常说的“冷战”与“后冷战”时期的划线法是否能反映时代变化的本质?

2. 相互依赖问题。这个问题论者甚多,但是仍有深入探讨的余地。相互依赖的观念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提出,在这里重温有关的一段话会使人感到意味无穷: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重点号为引者所加)。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马克思在这里所描绘的景象现在正在全世界范围内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实现着,并改变着传统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关系的观念。这段话的主词“资产阶级”可能需要用更广泛的主体来替代。通常认为,相互依赖的结果使得有关各方都有薄弱点,因而是避免战争和恶性冲突的因素。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利害关系密切,摩擦也会增加,还有相互依赖不平衡造成的不平等关系至少在短期内可能更加强权政治的作用,等等。另外,在复杂纷纭的国际关系中,造成相互依赖的各种因素及其

形态、程度和后果等都是远未穷尽的问题。

3. 国家主权的作用及其限制。这个问题部分地是由上面的问题派生出来的。当然不仅如此,更主要是在“全球化”趋势这个大背景下,在现阶段应如何看待国家主权的作用和范围的问题。这个问题在长期趋势和短期现实之间矛盾较大,亦即一方面,我们看到一种强有力的世界性的趋同的势头,而另一方面,被冷战掩盖的或压制的民族性和民族要求正在大力伸张,甚至发展成极为尖锐的流血冲突。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理论界与西方国家分歧较大,在他们那里,特别是在美国,比较强调“主权过时”论,因为美国只有威胁别国主权而无自己主权受威胁的历史;而我国学者尽管在学理上承认传统意义上的主权现在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但是鲜有人同意“主权过时”之说,这就是处境和视角不同使然,但是仍然有许多具体问题可以作客观的学理的探讨。除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主权外,有一些也属于主权范围之事却不但是可以讨论的,而且是经常激烈讨价还价的对象,例如国际组织要求成员国遵守其规则,其中必然涉及一国主权范围的立法和决策受到限制。与此有关的,处于弱势的国家无时不感到的强权政治问题当前在什么程度上还起作用,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突破,这些都大有深究的余地。

4. 国际关系中的伦理道德问题。这是一个古老问题,但是内容常新。首先是国际间除实力与利益外是否存在道义原则?如果有,什么是公认的正义标准?这里“公认”很重要。这一点随时代而异,也随国际社会中有发言权的成员的范围变化而异。例如直到20世纪初,以白人至上为核心的种族优劣论还能堂而皇之的存在,而今不论某些人内心深处如何想,在国际社会中已是“公认”为非法的。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亦是如此。